

唐五代批评视野中的韩柳文及韩柳并称

ON THE COLLECTIVE TITLE OF “HAN LIU” IN THE VIEW OF CRITICISM DURING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刘城*

摘 要

韩愈、柳宗元因文章的典范意义，被世人并称为“韩柳”。二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领袖。当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及散文史著作都如持这种观点。但学界的这种观点并不太符合唐代的事实。实际上，韩柳并称在唐代并不是批评的主流，二人在当时并未同时被世人看做是文风改革的领袖。韩愈在中唐已逐渐确立“文宗”的地位，其求奇求新之文风具有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引起极大争议，而柳宗元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韩柳文并称在晚唐才出现。而韩柳并称以及二人同被世人目为文坛领袖的观点则是在北宋以后才逐渐流行并定型。

关键词：唐五代 韩柳文 韩柳并称

ABSTRACT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have been called “Han Liu” for their modle of prose. They are also treated as the leader promoting the stylistic innovation. Most books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prose hold this view. But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facts. In fact,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were not both treated as the leader promoting the stylistic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eir lifetime. Han Yu had already been treated as Master of literature but the effect of Liu Zongyuan was much weaker. The Collective Title of “Han Liu” and the view that they both was treated as the leader promoting the stylistic innovation appeared in Late Tang and fell into a pattern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rose written by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Collective Title of “Han Liu”

*LIU CHENG 刘城（1980—），男，文学博士，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中国南宁）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 2017 年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与先秦文学。

当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及散文史著作都视韩愈和柳宗元二人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领袖。但考察唐五代典籍及唐人的批评可知，这种观点实际上不太符合唐代的事实。中唐时期，韩柳在当时并未同时被世人看做是文风改革的领袖。韩愈在中唐已逐渐确立“文宗”的地位，而柳宗元的影响远不及韩愈。韩柳文并称在晚唐才出现。而韩柳并称以及二人同被世人目为文坛领袖的观点则是在北宋以后才逐渐流行并定型。

一、韩愈“文宗”地位在中唐的确立

韩愈于唐代文名极盛，时人或虽对其文颇有微词，但其道德、文章常称颂于世人之口，一代宗师的地位亦是不易撼动。此不仅见于韩愈生前，亦被传于身后。

首先，唐五代人盛赞韩愈继承古之圣人的道统及卫道之功。这种激赏更见于韩愈的好友及门生的文章中。

张籍《上韩昌黎书》就认为，在孔子殁后，唯一能继孟子、扬雄而“言圣人之道者”，惟韩愈一人，且更是力劝其弃“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努力“嗣孟子、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可见张籍对韩愈继承道统的期许(董诰等编(卷六八四)，1983)。李翱《与陆惨书》亦谓“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李翱，不明)。赵德《昌黎文录序》明确韩愈所履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董诰等编，(卷六二二)，1983)之道。晚唐的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亦有类似论述。

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并序)》就激赏其捍卫儒家之道的精神与勇力。其云：

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人始未信。既发不掩，声震业光，众方惊爆，而萃排之。乘危将颠，不懈益张，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执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抵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与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秉密窃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已矣。

(刘新征，2012：221)

生动描绘了韩愈于中唐儒学衰微之际力挺圣人之道，其学终为天下信之艰难过程。张籍《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為大賢姿，天使光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為古文章。(張籍，(卷七)，不明)

“独得”二字既显出韩愈之寂寞，更衬托其力振儒学之功。这种不顾时俗，力倡儒学之精神，在晚唐也常常为人所道，如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谓韩愈“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萧涤非、郑庆笃，1981：22)，此“一人”即与张籍的“独得”遥相呼应，其又有《原化》云：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楊、墨也甚矣。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诤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萧涤非、郑庆笃，1981：88)

与皇甫湜之描述无异。

其次，韩愈不仅倡儒学，更是以儒学作为为文之根基，力辟当时浮华文风，宣扬儒家教义。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愈文集序》说韩愈：

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蹕，渊滋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铿然而韶钧发。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惘惘当世，遂大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乌乎！先生于文，摧陷郭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董诰等编（卷七四四），1983）

此论亦见于晚唐牛希济的《文章论》，其云：

古人之道，殆以中绝，赖韩吏部独正之于千载之下，使圣人之旨复新。（董诰等编（卷八四五），1983）

于世风日下、儒学衰颓之际以一己之力独振儒家之学，成就了“儒者”韩愈。他勇于卫道之精神在当时倾倒了不少士子，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即云：

去夫子千有餘载，孟軻、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睨阁下之门，孟軻、扬雄之门也。小子幸儒其业，与阁下同代而生，阁下无限其门，俾小子不得闻其道，为异代惜焉。（董诰等编（卷七九），1983）

除明韩愈之道统外，还强烈地表达了欲追随韩愈“儒其业”。这种愿以弟子师之的情况更是出现于文学领域。今人郭绍虞先生指出：“韩氏之教不外传道、授业二者而已。实则传道是后世道学家的事，授业者正是当时古文家的事。所以韩愈于此二者虽是并重，而比较言之，则韩愈于道的方面所窥尚浅，于文的方面所得实深。故韩门弟子与其谓之学道，不如谓之学文。”（郭绍虞，1999：215）

韩愈文宗之地位，于唐代已成为共识。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就曾透露当时韩愈与李翱为文坛盟主，其《祭韩吏部文》亦云：“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金如山。”（瞿蜕园笺证，1989：1537）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自贞元末以至於兹，后进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瞿蜕园笺证，1989：1537）王定保《唐摭言》卷六亦谓韩愈“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王定保，1978：63）

这种名声，使得士子多以之为师，且形成一定声势，对当时文坛颇有影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曾云：

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李肇，1957：57）

唐人赵璘撰《因话录》卷三亦云：

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赵璘撰，1957：82）

韩愈自己也勇于为师，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曾云：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赵璘撰，1957：82）

元稹《赠韩愈父仲卿尚书吏部侍郎》说韩愈“雄文奥学，秉笔者师之。”（冀勤点校，1982：544）唐人康骈《剧谈录》、佚名的《灌畦暇语》及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亦多有记载。这种勇于为



师、奖掖后进的做法，不仅能使更多的士子聚集在自己周围，且能扩大自己的学说及创作理念，陈寅恪先生曾说：“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歿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陈寅恪，1954：13）故学者所称李翱传其道、皇甫湜续其文即谓此。

韩愈一代宗师的地位，也使得世人极关注其文，评论亦颇多。王建《寄上韩愈侍郎》就说：

重登太学领儒流，学浪词锋压九州。不以雄名殊集作疏野贱，唯将直气折王侯。……序述异篇经总核集作别，鞭驱险句物先投。碑文合遣贞魂谢，史笔应令谄骨羞。（彭定求等编，（卷三〇一），1960）张籍《祭退之》云：

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彭定求等编，（卷三八三），1960）

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云：

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朱金城笺注，1988：3190）

李翱《故正义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

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董诰等编，（卷六四），1983）

又于《祭韩吏部侍郎文》云：

呜呼！孔氏云远，杨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剝剥不让。葩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駭，驱涛涌云。包刘越羸，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董诰等编，（卷六四），1983）

皇甫湜《谕业》云：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飈激浪，汗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漑，或爽于用。（刘新征，2012：103）

又于《韩文公神道碑》云：

七岁属文，意语天出。长悦古学，业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伟生，多以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为唐之章。（刘新征，2012：211）

另外，人们也关注韩愈的某些篇章，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就论《进学解》曰：

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董诰等编，（卷九七四），1983）

李商隐《韩碑》谓《平淮西碑》：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刘学锴、余恕诚，2004：908）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赞《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真良史才也”。

有正面称扬，也存在不少质疑之声。如针对韩愈作文求“奇”求“怪”以及“以文为戏”的倾向，在朋友圈里就引起过不同的反响。裴度《寄李翱书》就表达过不满：

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董诰等编，（卷五三八），1983）

而张籍更是连去《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二文殷切希望韩愈“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广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董诰等编，（卷六八四），1983），难怪《唐摭言》卷五云：“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二书。”（王定保，1978：55）

但柳宗元却对《毛颖传》之文颇多激赏，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担心《毛颖传》“恐世人非之”，故“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侔也”（柳宗元，1979：848），且于《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极力为韩愈争辩：

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窈窕，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柳宗元，1979：569）

并引经据典来论证古之圣人亦未弃俳，给予韩愈新文风有力的支持。韩愈的这种为文倾向，李肇《唐国史补》亦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1957：57）可见，元和以后，韩愈的这种创作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

二、唐人批评视野中的柳文

由上述可知，韩愈的文章、道德均为唐人所关注，虽间有异议，但多持肯定之声。反观柳宗元，由于其罪臣的身份及久居贬地，致使其长期远离人们关注，故而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韩愈。

现存唐人评柳宗元的资料极少，所论较多的是其文章与文风，好友刘禹锡论者最多亦最详。刘禹锡《天论上》论柳宗元《天说》：“文信美矣。”（瞿蜕园笺证，1989：139）《与柳子厚书》论《箴郭公墓志》：“繁休伯之言薛访车子，不能曲尽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倘伴伊郁，久而不能平。”（瞿蜕园笺证，1989：228）《答柳子厚书》说柳宗元的文章：“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踈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瞿蜕园笺证，1989：266）而韩愈赞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瞿蜕园笺证，1989：487）皇甫湜《祭柳子厚文》云柳宗元：“肆意文章，秋涛瑞锦。”（刘新征，2012：231）赵璘《因话录》卷三商部下云：“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赵璘撰，1957：82）至晚唐，司空图《题柳州集后》还对柳宗元之诗歌给予好评：“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司空图，不明）



柳宗元的文章、才华虽然亦赏于时人，但远未如韩愈一般受到世人的多方面关注，更遑论以文宗之尊去扫荡浮靡文风。相反，当时更多的人是以一种怜惜的心态去评论柳宗元其人，哀其人、才、文不为世用。所论基调多悲悯，且均见于朋友之文，范围极小。

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虽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钱仲联，1984：1128），但在《祭柳子厚文》也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刘真伦、岳珍，2010：1395），于《柳州罗池庙碑》云柳宗元：“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刘真伦、岳珍，2010：2290）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刘真伦、岳珍，2010：2408-2409）刘禹锡《祭柳员外》：“呜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从古所悲。”（瞿蜕园笺证，1989：1529）刘禹锡《重祭柳员外》：“出人之才，竟无施为。……生有高名，没为众悲。异服同志，异音同欢。……呜呼哀哉！君有遗美，其事多梗。”（瞿蜕园笺证，1989：1531-1532）刘禹锡《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孔氏四科，罕能相备。惟公特立秀出，几于全器。才之何丰，运之何否！……变时移，遭罹多故。……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瞿蜕园笺证，1989：1535-1536）吴武陵《遗孟简书》：“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董诰等编，（卷七一八），1983）

论其文，哀其人，是唐人论柳宗元之核心。亦有赞柳宗元之德的，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即以“以柳易播”之事讥讽“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诋诃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刘真伦、岳珍，2010：2408）的世风，大赞柳宗元重友情之义举。此事亦为赵璘《因话录》所载（赵璘撰，1957：72）。韩愈还在《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中盛赞柳宗元治理柳州之德。

与韩愈勇于为师不同，柳宗元则拒为人师（徐伯鸿，2008：49-52）。宋人陈善有云：“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当此责也。韩退之抗颜为师，虽子厚尤有所忌，况他人乎？”（陈善，（卷二），不明）这也是柳宗元在当时未能成为文宗的一大原因。对于他人欲变其“不为师之志，而屈己为弟子”之请，他于《答严厚與秀才论为师道书》回复云：

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柳宗元，1979：878-879）

他避为人师，是要避其名，但对于士子对于“言道、讲古、穷文辞”的请求，柳宗元则是倾囊相授，故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赞之：“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刘真伦、岳珍，2010：2408）不过，这种指导多于柳宗元贬谪永州及柳州之后，两地的文化及科举在唐代本来就不发达，如现在可考知的有确切籍贯记载的唐代进士

人数为 846 人（吴树宝，2009：1-2），湖南中进士者共 25 名（蒋建国，2002：39），广西则有 12 人（蓝武，2004：134）。柳宗元对永州、柳州等地惠泽极厚，为后人称道，但对于当时而言，影响还是极为有限的。

三、杜牧首标韩柳与《旧唐书》韩柳比较之发端

五代《旧唐书》载史臣语云：

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刘昫等编，（卷一六），1975）

五代史臣于此不吝笔墨称赏柳宗元、刘禹锡为文华美巧丽，文才出众，但却“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批评柳、刘的持道不严、附昵小人的同时，却肯定韩愈、李翱弘道之心及其出自仁义、语切典坟之文。这种论述实开自宋迄清对柳宗元人格进行批评的先河，进而影响到对其文章的客观评价。

在唐五代，人们多已视韩愈为文宗，且把其文章与明圣入之道、复儒学之尊联系起来，并肯定其力振颓风的功绩。但对于柳宗元则从未有如此评价，相反，在《旧唐书》这样官方的叙述中，柳宗元甚至成了对比韩愈的反面例证，虽有文才，但却“蹈道不谨”，自毁前程。不但与韩愈无并称的可能，遑论与韩愈并提为共振颓风、推尊儒学的人物。

虽说如此，在韩柳逝世之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以二者并称。目前可知最早的韩柳并称见于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诗云：

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吴在庆，2008：81）

杜牧于此首次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者并称，且把李杜、韩柳分别视唐代为诗歌、文章之典范。

唐及五代的韩柳并称之例几乎是以韩柳文作为论文之典范，兹列如下：

外王父左冯翊太守讳敬之，韩吏部、柳柳州皆伏比贾马。文章气高，面诃卿相豪盛之非，盖不得为达官。（吴刚主编，2007：391）

杨公（杨敬之）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高彦休，（卷上），不明）

（柳仲郢）撰《尚书二十四司箴》，韩愈、柳宗元深赏之。（刘昫等编，（卷一六五），1975）

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彭定求等编，（卷六七七），1960）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王定保，1978：113）

刘牧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文章与韩柳齐名。（王定保，1978：120）



这些例子多在论述他人文章时独标韩柳之文，无疑是把其当成评判的标杆。这也表明韩愈、柳宗元逝世后不久，人们已开始关注二人的文章，且有意识地把韩柳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整合、并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称，几乎专指文章而言，这也是韩柳文研究史上最初颇具意义的发明。成书于公元 945 年左右的官方史书《旧唐书》却忽视了这一现象，且在极为重要的史臣论赞中把韩、柳之文加以对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也表明，韩柳并称的观念于唐五代还不十分普遍。

综览唐代典籍和唐人的文学批评可知，韩柳并称在唐代并不是批评的主流，二人在当时并未同时被世人看做是文风改革的领袖。

韩愈在中唐已逐渐确立“文宗”的地位，其道德、文章常称颂于时人之口，一代宗师的地位亦是不易撼动，其求奇求新之文风具有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引起极大争议。而柳宗元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他的文章、才华虽然亦赏于时人，但远未如韩愈一般受到世人的多方面关注，更遑论以文宗之尊去扫荡浮靡文风。而柳宗元由于其罪臣的身份及久居贬地，致使其长期远离人们关注，加上他不愿为人师的性格，导致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韩愈。

韩柳文并称在晚唐才出现，但韩柳并称的态势发展并不稳定。《旧唐书》就因政治与儒学的关系，把柳宗元置于韩愈的对立面。真正意义上的韩柳并称以及二人同被世人目为文坛领袖则是在北宋以后才逐渐流行并定型。关于此，笔者有专文阐释，此不赘述。

参考文献

-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五代】刘昫等编·旧唐书（卷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五代】刘昫等编·旧唐书（卷一六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刘新征·皇甫湜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
- 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宋】陈善·扞虱新话（卷二）[M]·民国校刻儒学警悟本·
- 吴树宝·唐代进士群体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9
- 陈寅恪·论韩愈[J]·历史研究，1954（2）
- 【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M]·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徐伯鸿·谈柳宗元的拒为人师[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2）
- 【唐】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七）[M]·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 【唐】张籍·张司业诗集（卷七）[M]·四部丛刊景明本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 【唐】赵璘撰·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 【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M]·清知不足斋本·
- 萧涤非、郑庆笃·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〇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八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七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三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一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四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四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七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蒋建国·唐代湖南科举述评[J]·云梦学刊，2002（6）
- 蓝武·论唐代广西的科举考试[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 冀勤点校·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